

## 秦越人、扁鹊与《难经》

研究生 周立群

指导老师 郭霭春

扁鹊是中国古代著名医家之一。关于他的生卒年代、医事活动、思想理论及著述的考证，对了解中国早期的医药卫生水平、中医理论基础的奠定以及一系列史实的确定性，有重要意义。《难经》为重要的中医经典著作之一，是构成中医基本理论框架不可缺少的部分，故历代医家多以《内》《难》并称，尊为医经。然而毕竟年代久远、史迹湮隐，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是十分困难的。关于扁鹊的生平活动甚至是否确有其人，《难经》的成书年代及其著作者，扁鹊与《难经》的关系，迄今众说纷云，莫衷一是。本文试就此提出一些初步看法，以供商讨。

## 一 扁鹊其人和《难经》成书

要深入研究扁鹊与《难经》的关系，首先必须弄清扁鹊是否确有其人，如果有，大约的生卒年代及事迹如何。《难经》成书又在何时。

1. 秦越人、扁鹊是战国早期的伟大医学家。

据《史记·扁鹊传》载：“扁鹊者，勃海郡鄆人也，姓秦氏，名越人”。这是有关扁鹊的最早记述。究竟扁鹊和越人是否为一人，历来说法不一。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说：“秦越人与轩辕时扁鹊相类。”张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补注》则云：“扁鹊之称，既不与越人相

干，又略无伯仲等意。”还有人根据史料记载，认为曾先后出现过很多名为扁鹊者，而越人与扁鹊并非一人，是不相关的。至于《难经》一书只是伪托古人而已。

然而，近年来不少学者的精心考据，证明先秦人已有姓名和字的习惯，而且名与字有一定联系。如扁，通翩，疾飞也。越，远也。因此，越人为名，扁鹊为字，是不难理解的。〔1〕从文献看，一些医家将扁鹊作为行医的旗号，或当作名医的代名词，都是可能的。同时，名为越人的，也非仅有，如《战国策·韩策》中有段干越人之名。但是，扁鹊和越人同见于记载一人之名字，却唯见《史记·扁鹊列传》中。由此不难看出，根据概念间相容交叉的逻辑关系，作为战国时期的一位伟大医家，既不同于其它若干名为越人或叫做扁鹊的人物，又绝非一般的行医旗号，其人应当是存在的。他的全称是姓秦，名越人，字扁鹊。如日人滕惟寅著《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割解》所言：“周秦间凡称良医，皆谓之扁鹊，犹释氏呼良医为耆婆也，其人非一人也。但受术于长桑君，治虢太子病及著《难经》者，是即秦越人之扁鹊也。其诊赵简子者，见齐桓侯，在国策所谓骂秦武王，在鹞冠子所谓对武文侯者，又为李醯所杀者，皆是一种之扁鹊也。注者不知而反疑年代龃龉，枉为之

说，可谓谬矣。”其论虽未必全是，然泾渭分明地澄清“秦越人之扁鹊”与“良医皆谓之扁鹊”的不同，还是语中肯綮的。

再从《史记》《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所载，看与扁鹊生卒及行医活动有关的史实，不仅事迹可考，且年代亦相吻合。〔2〕

## 2. 《难经》约成书于东汉中期

《隋书·经籍志》言：“《黄帝八十一难经》二卷”。这是著录最早的根据。因《难经》未被收入《史记》、《汉书》等重要史籍，又因其文辞不似《内经》古典难通，因此不少医家和史家断为伪书，认为出自六朝人之手。《古今伪书考》云：“《难经》一书，大半可信为后人伪造，而托名于扁鹊”。近人通过对《难经》第一注家吕广的考证，亦持此说。同时仁者见仁，或论《难经》成书于秦汉之际，也有人竟言其为战国之作。总之，至今尚无定论。

我认为，判断古书之成书年代，是较困难的一项工作，除了凭借充分的史料，运用训诂学等有力手段外，而认真研究著作自身的内容、结构体系，支配作者思维的哲学观点及决定其认识能力的生产力水平，以至各种社会因素，也是十分重要的。此外，运用理性思维和清晰的逻辑观念去解剖整理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也是使认识深化，进而得出正确结论所绝不可少的条件。基于上述想法，分析《难经》成书问题，初步认为该书约成于东汉后期，即上限在东汉中期永元元年以后，（约公元89年）下限在东汉末年献帝建安之前，（约公元196年前）。主要理由略陈于下。

（1）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编著的《史记》和班固所修《汉书》内容广博，可谓详备，尤其在《汉书·艺文志》中载有多

种医学书目，对了解当时的医籍情况极有价值。然在这两部规模宏大的史书中，都未见《难经》的记载，如果说在秦汉之际已形成象《难经》那样的著作并流传，恐怕是不大可能的。

（2）从《难经》的内容看，其间杂揉一些谶纬说法。谶纬的起源虽然很早，但是到西汉哀帝、平帝的时期（约公元前5年）才兴盛起来并流行于东汉。故《难经》成书不早于此时是易见的。正如日人丹波元胤在研读《难经》后，指出“其绝非出西京人手”。

（3）再从《难经》的文字看。《难经》之文比较《内经》的确浅易，文风有别。这固然与问答的文体有关，在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作者的时代风格。象徐灵胎直言：“未见此书为秦汉人作”，不是没有道理的。诚然《难经》的部分内容理趣深远，卒非易了，可能渊源很早。众所周知，一书素材的积累与最终的成书年代毕竟是不同的两回事。

（4）引经文以设问是《难经》的行文特点之一。全篇言经曰者，达三十五处之多，但其中多有《内经》未见之辞。不难看出，《难经》是在很多医经存在的情况下成书的。从社会历史发展看，先秦克伐战乱、兵戎相见，不可能产生《内经》等卷帙浩繁的医经著作。至西汉中期形成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空前昌明的局面。这些为医家提供了搜集文献并进而撰述新著的条件。因而象《史记·仓公列传》所说的，有了“《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等篇。而在《汉书·艺文志》，所载医书有很大发展。该书《方技略》中列述《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

十四卷。由此了然，到西汉末年，医家广泛著述，这就为《难经》成书提供了必要的背景和基础。

(5) “八十一难”最早见于《伤寒论》自序中。可见仲景著书已撰用《八十一难经》无疑。如此，《难经》成书于仲景之前，也就顺理成章了。再者仲景将《八十一难》并列于五部医书之中，说明当时已流传较广。因此《八十一难》成书的时间当由此上溯若干年，即最晚在东汉末建安元年(约公元196年)之前，是较合适的。

《难经》一书指为越人所作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转引梁阮孝绪所著《七录》，以前史书概无记载。不少医家，史家据此提出异义，认为仲景序文中的“八十一难”是九卷与素问篇名之误，姚际恒谓是书乃六朝人伪托，这些说法是根据不足的。从《伤寒论》内容看，多处论及“寸口脉”，论关尺脉者更达十数条之多，可见当时已盛行独取寸口的切脉法。

(3)《金匱·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关于上工治未病等论述，皆源自《难经》。再者，《伤寒论》理法方药兼备，是书可作为中医基本理论已较成熟的标志，其后别立经文，对医理结构体系卓有创新突破者，可谓无存，遂形成言必称经旨的局面。而似《难经》这样对脉学、经络、脏腑、疾病、俞穴、针法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有重大贡献的医经著作则应是在此前产生的。如此分析，则仲景之书是在《内》《难》等大量医学文献的基础上产生，具体地运用体现这些理论著作。

(6)《太平经》卷五十《炙刺诀》记载，建安元年，其时针刺疗法已较普遍，疗效为“治百中百，治十中十”。这与《难经》从六十二至八十一难注重对输穴、针法的阐发是相吻合的。据曾朴的《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九记述，公元216

年，当时医经著录于史籍者七部，可考卷数者十六。可见当时对医经的研究是较为盛行的，虽经烽燹，存书尚富。《太平御览》引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曰：“黄帝命雷公歧伯论经脉，旁通经脉八十一为《难经》。”可见晚于仲景四十余年的皇甫谧也曾见《难经》，对其作者却不甚了了。晋王叔和在皇甫谧之前，更近于东汉，在叔和所著《脉经》和皇甫谧的《甲乙经》中，论及辨尺寸阴阳荣卫度数、持脉轻重法、辨脉阴阳大法，奇经八脉、五脏积发伏梁息贲肥气痞气奔豚等，几乎全部出自《难经》。以上有关汉末晋初医学发展的历史记载和医家著述，可作为仲景言“八十一难”即为《难经》的有力佐证。

## 二 《难经》与秦越人扁鹊的关系

如上所述，既然秦越人·扁鹊是生活在战国时代的一位伟大医家，而《难经》又成书于东汉后期，则《难经》绝非成于越人之手可成定论。然而何以历来医家称《难经》为越人所作？对伪书一说又应怎样看待？以下仅就自己的认识略述管见。

### 1、关于断《难经》为伪书的问题

所谓伪书之称，首见于汉王充《论衡·对作》：“俗传蔽惑，伪书放流”。大凡言伪书，不外三种情况，一者原作者已无考而托名于前人的，如《六韬》之托于吕望。二者原书已佚，而后人有意作伪的，如孔安国《古文尚书传》。还有一种成书较晚，而相传为前代著作的，如《周礼》之托为周初著作。我认为，《难经》与前三者均有不同，虽《难经》成书东汉而作者却为战国越人似可定之伪书，然深入分析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学术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秦越人的实践和《难经》的突出贡献，便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有着一定内在的联系。换言之扁鹊对《难经》一书是

有重大影响的。《难经》的很多思想精髓和独创性的理论内核则受到扁鹊的深刻启示并由此发端。后人经过发展补充其旨，最终完成八十一难的著述而仍推崇开其先河之扁鹊为作者，这并非牵强附会肆意穿凿，更不是凭空杜撰，而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合乎情理的事，以下分析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

## 2、辨析内难关系，探索《难经》之源。

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的产生发展都是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哲学密切相关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不管自然科学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内经》正是运用了非常发达的理论思维和很高水平的哲学，取得了辉煌的医学成就。《难经》也是这样成书的，不唯如此，考察散见于先秦两汉正史及其它文献中的医学史料和专著，便可发现其中的共性，都烙有当时哲学的深刻印记，体现了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基本内容。由此可见《内》《难》思想体系和理论渊源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正是二者主体内容大致相似的原因。然而，据矛盾普遍性的辩证法则可知，在古代因地域环境的差别，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人们认识能力和方法的不同，对人体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系统的研究，必然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思想、观点和结论。加之师门授受、“各张其说”，即理论争鸣的作用，奠定了形成学派的基础，《难经》实为诸多学派之一。徐灵胎、谢利恒、张山雷等于《内》《难》多有歧义的问题均曾论及。任应秋教授更明确指出：“越人在当时的某些医学问题上确是一位与《内经》具有不同见解，而另立一个学派的大医学家”。一般认为，《难经》则悉本《内经》“干城轩歧、羽翼灵素”〔4〕“《难经》为灵素而

起”〔5〕。我认为此说如针对《内》《难》俱为阐发医理的著作是正确的。若以此强调《难经》的重要作用，论证其在中医学中的历史地位及价值，则有失全面妥当。这客观上易被人理解为《难经》是附属《内经》的一部注释性书籍，只要学习《内经》便可取代《难经》，从而忽略对《难经》的研究。更有甚者如徐灵胎则以《内经》规矩《难经》，将其所阐发之处视为“悖经”“倒经”“正多疵也”，遂致后学不明。难怪苏东坡《楞严经·跋》中斥妄薄《难经》者，“非愚无知，则狂而已”并感叹：“医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谓难经不学而可，岂不误哉。”所以，必须正确评价《难经》的历史意义。欲如此则探讨其成书过程是很必要的。

《难经》以问难之体裁，阐述了生理、病理、治法等一系列重大命题。故该书并非《内经》的注解，而应是针对当时所存的多种医经，包括《内经》就广泛的医理特别是与本学派观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论辨以申其义。在当时设问答以明道理是被广泛采用的一种文体，《难经》可能是先秦文体的遗绪。因此，质疑问难不能定为专释《内经》而设，如《内经》中多有黄帝与歧伯等相互问答，也不外是阐述道理的一种方法。

综上所述，《内经》是祖国医学基本理论体系最重要的著作但不是唯一的著作。宗《难经》者作为别有师承的医经一派与《内经》是相发明者的关系。由此可见，《内》《难》主旨相近，原因是二者产生于同一历史文化背景之下。而《难经》所独发明者又是其本学派自身运动发展并与其它观点争鸣的必然结果。要之，《内》《难》同源异流，又在共同构成祖国医学体系的前题下殊途同归，统一为一个整体

——“皆医中之开辟草昧者也”。

### 3. 从《史记·扁鹊传》看《难经》

既然《难经》是一派学说之结晶，那么这一派的源头在何处，其学说之开山者又是何人？细研秦越人·扁鹊的记载，结合统观《难经》全书，草灰蛇线或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1>《史记·扁鹊传》云：“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有人曾认为扁鹊是中国脉学发展史上的先驱者。扁鹊作为对脉学深有研究的医家是为后世所公认的。《难经》确立独取寸口的诊脉法，是该书最杰出的贡献之一。寸口脉法之所以是历史上的一个进步，主要特点是简便实用切合临床。而扁鹊重视脉诊，从事临床实践，一生忙于活人，若说他有发明寸口诊脉法的可能，可以说是合乎情理的。当然，“独取寸口”之诊脉法逐渐代替遍诊法是要经过反复实践，比较过程的，至《难经》问世才予确定。

<2>《扁鹊传》中记载扁鹊尊长桑君嘱饮上池之水，于是能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症结。”我理解，在这里如果不是指扁鹊确有特异功能，（尚无定论）则是言扁鹊深入细致地掌握了内脏、血脉之征象，谙熟人体内景，洞悉五脏六腑形态，因而能“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而言病之所在”。当时的解剖学水平是较高的，这可以从中庶子描述俞跗一节得到旁证。再从《难经》看，其中论内脏的长短、度数，分寸极为详细，如不是非常重视脏腑实际形态并有深入研究是很难做到的。以至后人评论：“扁鹊著《难经》用人体解剖来阐明脉理和病理，完全脱离了神鬼迷信的影响。”〔5〕另外，左肾右命这一独创的理论，似也和重视形质，以形为解释生病理的基础有关。如五脏配属五行，然五脏中唯肾左

右各一，从这一事实考虑，人体以阴阳为根，水火当各有其宅，故以左肾右命分别主持阴阳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这些理论的产生是从长期生病理观察和临床经验的总结发展而成的，但解剖学及对形质的认识是重要原因之一。

<3>《史记·扁鹊传》中扁鹊入虢之诊在分析病机时云：“若太子病，所谓尸厥者也。夫以阳入阴中，动胃、缠缘中经维路，别下于三焦膀胱。”《难经》第三十一难云：“三焦者，火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下焦者，当膀胱上口，主分别清浊”。两者论三焦不无相通之处。

<4>《扁鹊传》中提出病有六不治的观点，并明确论及“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体现了有病早治，既病防变的治则思想。这与《难经》广其治则、垂法后世是相一致的。如七十七难云：“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是使这一治则更具体化的实例。又如扁鹊诊虢太子之疾，针对其“邪气蓄积而不得泄”之实证病机，采用“取外三阳五会”、内服“入臍之剂”的泻法，与《难经》“实者泻之”的明确论述也是相同的。

<5>《扁鹊传》行文很短，记述较少。但从中对扁鹊重视经脉，在临床诊断、病机分析以及治疗上运用经脉理论，亦可窥见一斑。如文中“阳脉下遂，阴脉上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等言经脉者达八处之多。而《难经》对经脉的长度、流注次序及运行规律，十二经经气绝的证状和预后诊断，撮其要点简明清晰。尤其二十七难具体阐述了奇经八脉的名称、起止，病候及与十二经脉的关系，丰富了中医经络学说的内容，乃《难经》又一重大贡献。这些有别于《内经》之

处，是否与《难经》师法于扁鹊有关呢？

<6> 据证，扁鹊治虢太子病的史料根据最为充分。〔7〕《扁鹊传》记载使太子复苏的首要方法是“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可见针刺是扁鹊运用娴熟、得心应手的重要疗法。如非谙熟经络输穴，深得精湛的刺法技能，则是难取如此速效的。《难经》“敢于创新，丰富了针灸疗法”，颇为后世所称道，其独到之处亦必别有师承。

统观上述诸论，使我们饶有兴趣的发现，在《难经》所有作出重大贡献的方面，似与扁鹊仅存的史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多关键性问题的联系，不再仅是一个点，而是一个体一条线，用完全偶然巧合是难于解释的。这就有理由提示我们考虑，《难经》独有创见之论，多出自秦越人·扁鹊之枢机，其理论的精髓经历代门人弟子或宗其说者不断发挥完善，最终在东汉成书为《八十一难经》。该书成于何人之手现很难考定，但可断言，该书必是在长期积累、丰厚渊实的素材基础上辑成的。其时可能已有流传既久的乌型《难经》存世，只是信为越人所传而书名不为《难经》而已。这样，成书者仅作了“始定章句”纂集命名的工作，乃仍言是书为越人所著，并非托古以自重，而是理所当然的事。科学史提示我们，似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如孔子讲学游历各国，亲自著述

不多，而由他的门人弟子及传其学者编纂《论语》当然以孔子名之。韦昭《国语解·序》以《左传》为《春秋》内传而以《国语》为《春秋》外传，司马迁更明言：“左邱失明，厥有国语”。“成左氏春秋”把此两书的作者都归之于左邱明，籍此两书大部史料出自左邱明的传诵言，其说是有根据的。“大凡古代学术，最重传授系统，谁是最初传授者，谁就是作书的人”〔8〕这犹如《公羊传》《谷梁传》写定于汉初而此两书仍说是公羊高，谷梁赤所作。古希腊科学的先驱者苏格拉底也无几多亲自著述，而由伯拉图等人整理完成的巨著仍毫无疑问地归其名下。近代亦不乏其例，而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古代，这种情形更多。至此，扁鹊为《难经》理论之源，其书非卒成于一时一人之手以及扁鹊与《难经》的关系也就可见端倪了。

### 小 结

《难经》成书于东汉，是战国时代秦越人·扁鹊所创始的一派学说的理论结晶。该书是中国医学史上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它的光辉科学价值和《素》《灵》一样传示后昆。探讨它的著者、成书年代及真伪，不仅是为某人某书归功正名的问题，而是关于祖国医学体系的形成发展以及当时科学文化背景与医学之关系等重要命题的研究。因此应引起高度重视。

### 参 考

1 郎需才《秦越人字扁鹊考》《吉林中医药》1983(5)

2 何爱华《秦越人·鹊扁生卒及行医路线考》《新中医药》1958(8)

3 何爱华《我对难经著作年代的商榷》《上海中医药杂志》1958(4)

4 日·藤万青《难经古义》。

### 文 献

5 周学海《难经本义增辑》。

6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编第五章第九节《战国文化的一般状况》。

7 程鸿儒漫谈秦越人与《难经》《中华医史杂志》1982(3)

8 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郑天挺编《左传选》后序1979年版，中华书局。